



中国近代辞书指要

A Summary of Lexicographical Works in Modern China

钟少华 编著



商務印書館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中国近代辞书指要

A Summary of Lexicographical Works in Modern China

钟少华 编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代辞书指要 / 钟少华编著. —北京:商务印
书馆, 2017

ISBN 978 - 7 - 100 - 12868 - 1

I. ①中… II. ①钟… III. ①汉语—辞书—研究—近
代 IV. ①H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07496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中国近代辞书指要

钟少华 编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2868 - 1

2017年5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7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7 1/2

定价:55.00 元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前 言

辞书,是辞典、字典、百科全书一类工具书的总称,并不包括类书。笔者认定辞书的基本功能有二:一是人类知识的工具。是人类知识几千年发展进步、在人类各种观念长期演进后,升华而成为人类社会普适接受的概念,以条目形式作出简要说明,再将其按知识分类排列而成辞书。二是成为人类检索知识的工具。重点在明晰不同字、词的形、音、义上面;而对同一字、词的诠释,则尽量包括其在历史上的演变,以及文化上不同的实用状态。

古今中外各民族多有自己民族的辞书,其内容各有发展特色。笔者在1996年著:《人类知识新工具——中日近代百科全书研究》一书中,已经介绍了西方辞书和日本辞书,以及它们在近代对于中国的影响,也明确笔者的基本见解。只是该书仅以清朝末年中国出版的辞书作介绍,本书现在是进一步申引到1949年以前。

由于民国时期出版的辞书内涵过于丰富,本书先将民国辞书作指要式整理,尽量不在辞书理论及辞书文化等方面展开阐述,留待将来。

自序

辞书是文化的工具。文化的进步需要辞书作为工具。

辞书也是一个民族文化进步的标志。近代中国出现了约三百部中文辞书,明示了我们民族在文化上的深厚底蕴与勇于创新的变革精神。

字典里能看出大智慧(钱钟书语)。也就是说,辞书不仅是工具,也是知识的宝库。

辞书的条目,其最大的知识亮点,正在于作为中文字义、语义的载体,也是中文概念的载体。

一般完整意义的中文字典,应该在条目中写明字形、字音、字义。如果一字多义或多音,亦应该分别注明,再加上例句说明,能够让读者公允地判断与利用,从而获得一个该字的简约化概念。另外还应再加上检索系统与参照系统。

一般完整意义的中文词典(辞典),应该在条目中写明词形、词音、词义。其中对于词义,要说明该词义的来龙去脉,以及一词多义的诠释及例句。以期得到读者公允性判断与释疑利用。对于中文词义“旧瓶装新酒”现象,要特别明确其内涵的变化。

一般完整意义的大型百科全书,除了词典的全部要求外,更要在词义内涵上深入广泛地展开阐述,包括对于该词义的不同认知理论的公允性阐述。让读者通过一个条目,就能够获得一个完整的概念,一个完整的语义。

千余年间,世界各民族编纂字典、辞典、百科全书时,不约而同地都以为读者服务为宗旨。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工具书的发展更加兴旺与丰富,延绵至今。目前的工具书理论上依然承袭一贯的原则,尽量诠释词义概念。只是在实践中各种工具书的差距还是相当大的。

中国文字以“字”为单位,在古代,字书相当活跃。1716年出版的以康熙皇帝命名的《康熙字典》,对47035个字进行了馆阁体式诠释,是中国第一部“字典”。百年后的1815年,英国人马礼逊在澳门也出版字典,形式上完全按照《康熙字典》的47035个字排列,但将诠释内容改变为当时中国社会

流传常用的字词,以及采用了新的拼音检索和参照系统。

在漫长的历史中,中文单个字所表述的语义内涵渐渐不够用,于是中国人逐渐将两个字、三个字拼装在一起,来表述更加复杂的语义。这就有了“词”的产生。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字书对于“词”的诠释相当薄弱,《康熙字典》出版后,也并没有再编纂一部词典。明朝末年兴起的类书系列,其编纂方针与字书、词书有本质的不同,类书虽提供某些词的大量用例,但并不判断该词的准确语义,更缺乏公允性。因此,实际上,到19世纪中叶,虽然已经有许多类书、字书的出现,但依然缺乏词书类的工具书。

随着中西文化碰撞与交流,到十九世纪末,中国人得知邻居日本已经出版大量字典、辞典与百科全书,于是在维新新政旗帜下,中文的各种新工具书随时代而涌现。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到清朝末年的1911年,中文各类辞书有近50部(不包括双语辞书)^①。而在民国时期,即1912年至1949年间,笔者在本书中已经介绍的辞书有400多部(不包括双语辞书)。

当我们重新使用、翻看这些一个甲子以前出版的辞书,仍给我们巨大的震撼。简约介绍六点:

(一)新知识体系的形成。当时世界先进知识的主要内涵,我们都能够从这些辞书中检索到。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有百余部辞书供读者使用。以往中国封建儒家长期统治所造成的知识弊箍,被凝固成牢锁民众思想的枷锁,在近代中国,被彻底颠覆了,一代新知识分子的思想为中华民族铺开了崭新的知识道路。

(二)新工具方法的运用。新的、准确的、公允的字义、词义能够方便地被检索;新的参照系被利用;新的与西方文字接轨的工具书思想被普遍利用(还不包括双语词典);新的印刷出版方式大大方便了读者的选择;等等。

(三)国音、国语的形成与推广。两千多年前的秦始皇,只规定了“书同文”,以后就没有人去做“字同音”“字同形”“字同义”等方面的工作,以致中文中的问题多多。不料却在近代乘变革之风,由几十位书生牵头,政府批准,没有花费什么经费,更没有什么暴力反抗,就在短短十几年间,通过国音运动、国语运动,经由全国推广,解决了“字同音”的千古难题,还包括语法、标点符号等难题。本书中收集的百余部国音字典、国语辞书等,就是明证。

(四)新词语的涌现与活跃。在中文漫长的发展阶段,由于多个民族与宗教文化的演变,中文词语的积累与演变一直复杂多变,各个时期的新词语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17世纪以来,远征西方的词语文化被引进中国,这只小蝴蝶飞进来,到19世纪,更以1815年的马礼逊《华英字典》和1866年罗存德《英华字典》为代表,他们所引进的西方新词语,中文就开始卷起语言

风暴,到20世纪初,再加上日文的变化引入,已经可以说是中文的语言海啸了。新词语不可阻挡地进入,至今依然在狂啸,虽然还没有整理清楚其中的种种因由。这些百科全书条目的语义恰恰多是那个别时期的种种痕迹,多是新词语的组成与诠释,就连大量旧词语也在实用中旧瓶装新酒,改变或丰富了原来的语义。这些新词语在辞书中所表述的概念,也在潜移默化中力图逐渐规范新词语的语义,也规范旧词语所赋予的新内涵,并已经成为我们今天的日常用语了。

(五)新思想的产生。这些百科全书,记录了当时活跃着的大量新思想,作出了基本的各种公允介绍。而这400多部辞书,也表现出一种新的思想,笔者名之曰“百科思想”。这是一种新的综合授信,能够通过百科全书对新的文化问题、思想问题进行全面的思考分析,进而推动我们的思想。

(六)一种新文化形态的产生。这些辞书的编纂者们,开拓了全新的文化工具书,他们的思想与行为是很值得研究的,其中包括他们翻译的外来辞书,也包括他们所开拓的编辑方针与条目参照系。这些辞书的序言作者,大多是当时名流,他们对于百科全书的看法是具有历史价值的。这些辞书的出版商,也是后人需要研究的对象。

当然,这些在19—20世纪出版的中文辞书,比起当时西方辞书以及日本辞书,差距还是相当大的,在数量上、质量上都普遍不足,特别是在辞书条目语义概念的准确表述上面,还问题多多。

笔者关注这些中国人的文化新产品,是从30多年前开始的。那时姜椿芳前辈在做《中国大百科全书》主编,他在《辞书研究》上面发表创刊词,说他编辑的是中国第一部百科全书。有一天他来看我父亲,我就捧出一部线装书给他看,是黄摩西编的《普通百科新大词典》。他老人家马上就明白了,夸我是“有心人”,鼓励我研究中国的辞书。后来我就在旧书店中不断搜集相关图书,并且尝试写文章。1987年,香港中文大学谭汝谦教授邀我去讲学。我讲完一讲后,陈方正所长问我还想讲什么?我就将我搜集到的约40部百科全书以“清末百科全书研究”名义说出来,台湾王尔敏教授主持会议,给予我很高的评价。到此我才明白,原来这是一个能够成立的课题,我也才放心地将写成的两篇论文交给《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学报》发表。1993年,日本竹内实教授邀我去京都研究中日近代百科辞书,我用一年时间看到了日本学者的学风,以及十分丰富的文献。回国后就写成《人类知识的新工具——中日近代百科全书研究》一书(已出版)。我书库中的这些辞书,给予我许多知识的支持,当我将视角转向中文语义学、中文概念史研究时候,它们更是我强有力的知识支柱。前年,商务印书馆李智初先生来寒舍,见到这

些辞书后,立即建议我编纂成书,还要附上书影,由商务出版,我自然愿意。于是就有了这部书的出版,让这些沉睡多年的工具书能够再一次为书生们服务,何乐不为!

早在90年前,胡适先生发表“劝善歌”,歌曰:

少花几个钱,
多卖两亩田,
千万买部好字典!
它跟你到天边;
只要你常常请教它,
包管你可以少丢几次脸!①

林语堂先生见后,回复一首,节如下:

落日楼头,
断鸿声里,
近代文豪,
把文法看了,
字书遍查,
终难会,
原文意。
想花两块钱,
想卖两亩田,
真正买了一部大字典!
可是问题不是这么简单!
牛头难对马嘴,
字义每每双关:
.....
这却要怎么办?②

① 胡适:“胡说”。原载《现代评论》1卷21期,1925年。转载见吴曙天编《翻译论》,光华书局,1933年1月一版,页27—28。

② 语堂:“劝文豪歌”。原载《语丝》31期。转载见吴曙天编《翻译论》,光华书局,1933年1月一版,页2—3。

笔者不会作诗，不能附骥尾，碰巧在二十多年前写下几句话，聊以充数：

聪明的人经常查阅百科辞书，
自满的人忽视轻蔑百科辞书，
愚蠢的人自以为是百科辞书。

钟少华

目 录

总述	1
----------	---

上编 语言类(1912~1949 年)

一 概述	17
二 语言知识类辞书	19
(一) 国音字典	19
(二) 一般语言字典	32
(三) 一般语言词典	44
(四) 语言学视角之辞书	62
(五) 俗语辞书、成语辞书等	71

中编 社会科学类

一 概述	91
二 社会科学知识类辞书	93
(一) 哲学辞书	93
(二) 社会科学综合辞书	102
(三) 文化教育辞书	122
(四) 法律辞书	128
(五) 政治外交辞书	135
(六) 经济学辞书	143
(七) 文学艺术辞书	152
(八) 宗教、心理学辞书	163
(九) 历史、地理、书志学辞书	172
(十) 地名、人名辞书	181

下编 自然科学类

一 概述	199
二 自然科学辞书	201
(一) 自然科学综合辞书	201
(二) 数理化辞书	206
(三) 博物、生物学、地学辞书	211
(四) 医药学辞书	220
(五) 农业辞书	237
(六) 技术类辞书	239
(七) 军事类辞书	247
(八) 资料汇编	251
近代百科辞书研究总结	257
参考文献	263

总 述

一、新文化工具

1912年至1949年,中国以中文出版的辞书到底有多少?一直是研究的空白区。笔者开始注意并且搜集,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了。至今,笔者所开录的辞书目录一共401部。在本书中具体介绍的辞书有194部。另外,中外各自出版的与中文有关的双语辞书,如中日、日中、汉英、英汉、汉俄、俄汉、汉法、法汉、汉德、德汉、汉拉、拉汉,等等,这也是相当多相当复杂的另外一个主题,本书只能不包括之,将来有机会再写。

据笔者的研究,中国近代辞书史并非自1912年开始,而应该是从19世纪中叶算起。笔者已经整理过的清朝末年的中文辞书近50部,另有专著出版。^①本书仅以这个时期的401部辞书为介绍对象。

辞书作为文化的工具书,一直为各民族重视。一来它是自己民族文化与知识积淀的基础,二来它是奠定自己民族内部文化字词交流与知识的工具。中华民族经历悠久历史的洗礼,在文字知识方面自然有大量的积淀,统一的中文方块字出现已有两千年之久,沿用至今。早在汉、唐之际,中文古代辞书就开始出现,作者们认真考辨中文字形、字音、字义,并且力图将之规范化。到清朝中期,所出版的中文字书目录就有很多。《康熙字典》可以说是古代主要辞书的总结,虽然说还有许多差错,但终究规范了47035个中文字的字形、反切音和古代简单字义。《康熙字典》自然就成为古代辞书的范式,但是也同时造成一个难以克服的历史障碍:试想古代文人只能硬背这四万多个字形,硬读这相当模糊的反切音,硬以不同时期古人对字义的解释

^① 拙著:《人类知识的新工具——中日近代百科全书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

释为准确标准,那么,且不用说其难度已经无人能及,更致命的是可能把文字文化的流动发展凝固化,这个民族就没有发展的需求与动力了。

当 19 世纪的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开始交流时,全新的西文认知系统就顺利地成为中文系统的新发展动力。其第一个代表是英国人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 年),他 1815 年在澳门就编辑出版了仿照《康熙字典》体例的《字典》,其字数与部首顺序与《康熙字典》完全一样,但是将反切音方法改变成用英文注南京官话读音,更在字义部分加进大量中国实际用语的解释与例证,特别是民间用法,包括《红楼梦》等书中所用词句等,还加上英文的参照检索系统。这样飞进中文领域的一只小蝴蝶,引来无数的跟进者,如德国人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 1822~1893 年)1866 年在香港编纂出版的《英华字典》,继续建构中文与西方交流的桥梁。后来中国学者参加进来,使得中文字形、字音、字义的解读工具越来越多,越来越进步,延续几十年后,最终在中文里面掀起语言飓风,至今似乎有越刮越热闹的趋势。中文近代辞书就是在这历史的必然中应运而成长的。

清朝自洋务运动以来的社会文化变革,使得中西文化词语的交流增多。特别是维新变法中,日本的新词语被大量引进到中文,变成中文新词语。日本的新辞书形式(即近代西方辞书形式),配上他们认真仔细搜集资料的传统,大放异彩。仅明治年间他们就编辑出版大小辞书 600 余部。其中大型百科全书,可以与《不列颠百科全书》相媲美。这不能不引起维新派的注意,康有为编辑的《日本书目志》中就出现许多日本辞书名称。接着在新政时期,有 10 部日本人编辑出版的辞典,被直接翻译成中文出版,还有 5 部中国人编辑出版的辞典,其基本内容是利用日本辞书资讯改编翻译而成。相比较而言,从英文直接翻译成中文出版的辞典才 6 部。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中日近代出版辞书数量如下:

中日近代辞书出版数量(不包括言语类)(部)

年代	1868~ 1877 年	1878~ 1887 年	1888~ 1897 年	1898~ 1907 年	1908~ 1916 年
中国		2	11	22	10
日本	33	28	37	117	82

清末 45 部辞书,有线装本,有当时新式洋平装本、精装本。由于当时的中国文化处于饥不择食的拿来主义阶段,所以辞书体例结构各式各样。翻译或编译出版的,自然接受原书结构体例,与今天辞书体例结构没有什么大区别。书前一般有序言、编者体例、条目顺序目录,书后有版权页,注明印刷

出版时间、地点、版本与编者等。多是洋装本，字体与印刷质量都比较好。而中国人编辑的辞书，则多为线装本，体例目录都简单。其中有东吴大学黄摩西教授主编的《普通百科新大词典》，可谓高水准。全书约有60万字，共收条目11865条，分为63门专门知识；还有笔画目录及分类目录，互相参照。这类新工具书形式，在古代是没有出现过的，比类书的体例结构大进一步。

如果从清末辞书的条目内涵观察，较传统类书，有许多明显的新特征：一是条目知识力求概念准确，不再随编者意愿云山雾罩地发挥。二是条目包含的知识面大大加宽，简单地说就是西学知识进入主流，中学常识经过提炼也进入条目，即是人类知识层面的内涵多有反映，不再拘泥于“体用之别”。三是内涵的知识性、科学性加强了，在政治体制、法律、经济、军事、医学、自然科学等方面多有涉及，使得当时年轻人很容易就吸收到许多过去没有出现过的知识，也让当时老一辈的书生们目迷五色，应接不暇。四是条目的汇编性、客观性、准确性虽比其他专门书籍大有进步，但如果按照辞书的标准看，则还是属于初级阶段。明显具有中国书生特色，多以抄写改编为手段。编辞书多是急就章，难以自主公允地写条目。编著者还难以具备准确写条目的能力与知识。

总之，笔者是认同清末译科进士颜惠庆的见解，将清末出现这些辞书，肯定为“中国进化券”。^①

1912年至1949年编辑出版的辞书，正是沿着前辈们的足迹，不断努力奋斗而来。

笔者还将“词典”、“辞典”、“辞书”这三个词，送进扫叶科技公司的数字库检索。因为在罗竹风编的《汉语大词典》中，“词典”与“辞书”全没有古义，而“辞典”则引南朝萧统《答玄圃园讲颂启令》：“辞典文艳”作证^②。这恐怕有问题。因为萧统《答玄圃园讲颂启令》中“辞”与“典”并列显然并非一个名词，而是“辞章典范，文采艳丽”的意思。由数字库中材料得出最后结果如下：

①“词典”一词在古代没有出现过。《汉语大词典》正确。

②“辞典”一词在唐代就有使用。宋朝宋祁文章中有：“虽荐侑大礼，别制辞典，然皆袭沿旧礼。”虽然这里的“辞典”语义不是今天的意思，但显然是在做一个名词用。

① 见《大英百科全书评论》，该书无出版项，估计为商务印书馆印刷，第2页。

② 参见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第6719页。

③“辞书”一词也是在唐代就有使用。五代唐刘蟠的文中有：“青州龙兴寺讲律僧处辞书”；唐朝李褒的文中有：“存辞书”；五代南平孙光宪著《北梦琐言》书中有：“其辞书，即冯涓极笔也”；敦煌(唐)文：“辞书平交”；元朝释念常著《佛祖历代通载》中有：“遣人送辞书到，师展书览之曰……”，这里的“辞书”也不是今天的意思，但也显然是做一个名词用。那么，《汉语大词典》中的“辞典”、“辞书”两个条目需要修订。还有，黄河清先生的《近现代辞源》中把“辞典”、“辞书”算成新词，恐怕也不妥。^①

下面简单分类简述：

二、国音字典

两千多年前，秦始皇就规定了“书同文”，让中文字形统一。但是后人长期没有去解决“字同音”、“字同义”的关键问题。直到20世纪初期，才有机会来全面努力解决。古汉语中的形声字占多数，这说明汉字字形与声音一直有着密切关系。汉朝末年发明了“反切”注音方法，它能分析一个字音为两个简单的音素，是一个进步，但只是进半步，因为仍然是借用不同的汉字来代表音素，还是借字表音。明末西方来华的一些传教士，以利玛窦为首，他们为学习中文的必要，使用拉丁罗马字和音，来对应汉字音。后来到清朝中后期，马礼逊编的《字典》中，就改为英文对应汉字汉音，还是以南京官话为准。只有到1867年英国人威妥玛出版《语言自迩集》，才开始记录与研究北京官话音。显然，西方人研究汉字音的努力，给了我们相当深刻的提示。到维新变法时期，陆续有一些中国学者关注字音问题，提出各种各样的变革“字同音”的方案。

1913年，“国音”一词突然被高度使用，一方面是北洋国民政府教育部的积极参与，成立“读音统一会”，首任会长为吴稚晖先生，副会长王照先生，来开会的各地代表79人，分为偏旁派、符号派、罗马字母派；另一方面是前述清末各种方案到此希望能够统一，会上讨论热烈，终有所协调，审议注定6500多个字的“国音”。当年底王璞先生受命将这些字编辑成《国音检字》出版。该书体例是同音字的汇编，每音复分为五声，汉英图书馆发行。

《国音字典》是吴稚晖先生在1918年首先在上海起草，将原先审定的6500多个字(是以清朝李光地著《音韵阐微》为基础选定)，再添6000余字，

^① 黄河清编：《近现代辞源》，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6月，第1版，第112~113页。

以及科学新字等 600 余个,共 13000 余字,并且按照《康熙字典》部首排列,定名为《国音字典》。吴先生拿稿到北京,邀陈懋治、王璞、马玉藻、钱玄同、黎锦熙等人共商,两夕而定。交由商务印书馆,在 1919 年 9 月出版。初版立即引发“京国问题大纷争”,后来不断修订改稿,不同出版社出版不同的修订版本,笔者已经统计到 40 多部。

“国音”当时成为以国家名义商定的新概念,并且是要与注音字母等合用定音,因此,各出版社都在书的体例中先声明有官方色彩,再说明“国音”的来源及使用方法,然后是本字形,后是注音,也有加旧反切音,以及很简单的解释,有一些书还附图。这些普及型的国音字典,在当时全国普及初级新教育中发挥了很大的功效,也就让新一代人掌握了汉字的全新的注音方法,发展至今就是汉语拼音方案。

其中有特别新式的书应该提到,那是 1920~1921 年,中华书局由陆衣言主持的《中华国音留声机片说明书》,该说明书就是国音教学片的内容,是经过教育部批准的,共 6 片 4 篇 12 课。接着在 1922~1923 年,商务印书馆由赵元任主持印制“国语留声片”及课本。以及 1947 年,由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魏建功、黎锦熙、卢前编订《中华新韵》,那是将“国音”的实践应用到诗韵,用注音符号表现其声韵。这都是很主要的成果。虽然尚有许多不足,但已经开拓了“字同音”的大道。

三、一般语言字典、词典

1912 年,一个新政权在中国诞生,国民教育成了当时头等大事,一股全新的力量在鼓动求知于世界,于是除了改良以往封建社会的教育落后外,还需要全新的工具书来给予民众学习的知识与方法。大量字典、词典的出现,就是我们民族在新时代的进步要求和行动。笔者在本书中具体介绍一般语言字典 11 部,具体介绍一般语言词典 18 部,还有仅提出书名的 56 部,即一共涉及 85 部。笔者在具体介绍字典和辞典时,先列举编者、出版社、初版年;然后将主要的序言部分引述,以凸显其对于辞书的认知;然后将编辑大意中主要有特点的部分引述,以凸显其编辑思想与原则;然后再选引一或几个条目,读者自能看到该辞书条目的特点,即概念的引述质量如何。

这些字典,已经基本与今天的字典结构体例一致,多有部首目录与笔画目录,每个字后有注音或拼音,或加反切。然后排列该字的不同解释,比较简单,也多有引述古文的例句,总体还是适合中小學生普及教育用的。字典